社會科學論叢 2007年10月
第一卷第一期105-144頁

儒家信念與地方治理效能：臺灣七縣市地方菁英之調查及探究（2001）*

Confucian Belief and Local Effectiveness: Survey analysis on Taiwan Local Elites in Seven Counties and Cities (2001)

國立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教授
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訪問教授 廖達琪
Da-Chi Liao
Professor of the Graduate Institute of Political Science,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Taiwan, R.O.C.;
Visiting Scholar at Hoover Institu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USA.

---

* 本文的完成，要特別感謝兩位匿名審查人的意見，國科會與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分別贊助作者所執行1993及2001年兩波地方菁英研究計畫；還有此研究計畫的國際發起人之一密西根大學的Samuel J.Eldersveld教授；本所博士生黃志呈先生協助提供統計資料，及計畫助理王英奬小姐的資料文稿整理。但一切文責仍由作者自

儒家信念與地方治理效能：臺灣七縣市地方菁英之調查及探究（2001）

廖達琪
國立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教授
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訪問教授

中文摘要

本文試圖探討儒家信念與地方治理效能間的關係。根據相關的研究及文獻，本文提出的假設是：儒家信念與地方的民主化發展無直接關係，但也無傷；對地方的經濟發展應有正面效益，但其條件為「政治表現和諧論」所提醒：地方領導群體間或地方菁英與群眾間，對儒家信念或相關價值有相當的共識。本文所運用的資料主要為廖達琪和Eldersveld於2000-2001年主持完成的「臺灣第二波地方菁英調查研究」中，所訪談臺灣七縣市菁英的紀錄，另外輔以2001年「臺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TEDS）訪談群眾有關民主價值的部分資料。

所得結果為：七縣市依據儒家信念強度排序，確實顯示和地方政治民主化治理績效指標——社會團體成長率及地方議會內政黨結構變化率，沒有關係，但也不構成傷害；七縣市儒家信念強度和地方和諧度結合一起，則和地方經濟發展的指標——家庭平均每戶經常性收入成長率及平均失業率，有較明顯的關係。

綜合以上，儒家信念與地方治理效能，確實如假設預期，有政治上不妨害民主發展，經濟上，在領導契合地方價值的情境中，有助於發展的功效；但地方菁英秉持儒家信念發揮治理效能的具體作為，還有待進一步的研究及探索。

關鍵詞：儒家信念、地方治理效能、臺灣、地方菁英、政治表現和諧。

壹、前言

東亞地區常被冠以儒家文化或筷子文化區，在這個地區的政體如：中國大陸、香港、臺灣、日本、韓國、新加坡等，常被認為具有相似的價值信念，頗異於西方的基督教文明，或是難分東西地域的回教文化。這一套價值信念的特色，相對於其他兩大系統，似是以「人」為中心見長，沒有「獨一真神」的概念，而在「人」世的範疇內，重視「人治」，及以血緣關係延伸出去的社會倫常秩序，所以通常被認為較重感情關係，而輕律法邏輯（黃光國，1999；費孝通，1991；Hsu, 1975；杜維明，2005；劉述先，1999；Tan, 2004; Bell, 2006; Tu, 1984, 1992）。這套儒家甚至被稱為儒教的價值信念，對東亞各地區或國家的治理及發展有何影響呢？

過往文獻確實不乏這方面因果關係的探討，但仍留有絕大的空間給後來者探究。因為一方面，相關研究發現或結果並不到能下結論的地步；另一方面，推論過程尤其引起諸多疑義。就前者言，儒家文化與地區治理效果最早被聯結討論的是經濟發展層面，有所謂儒家勤儉文化、威權集體等特質與亞洲四小龍（臺灣、香港、韓國、新加坡），由國家帶領經濟起飛的因果聯結（Kahn, 1979; Berger, 1984; Berger and Hsiao, 1988; Harrison, 1992; Mahbubani, 1995）。但這樣的聯結目前較少再被提及；[1] 而面對中國的經濟開放發展，也幾乎沒有文獻從儒家文化的角度來予以詮釋。[2] 所以，儒家文化與地區經濟發展之間的關係，似是正面，卻

1. 最近幾年，儒家研究似成顯學，相繼有Hahm and Paik（2003），Tan（2004）及Bell（2006）等從理論哲學的角度探討分析儒家內涵與政治民主及經濟發展的關聯性，但實證經驗研究還是從缺。
2. 事實上，中國雖無疑問的被歸類為「儒家文化」區，但就經濟發展的情況而言，中共在七〇年代末期開始所謂的改革開放前，經濟的停滯落後也是舉世有目共睹，難道是共產主義如此強悍的壓制了儒家文化的影響嗎？還是儒家文化並不如現代理論家所設想的那麼有助於經濟發展，如韋柏（Max Weber）就持不同看法，認為儒家的講求順服權威，不一定有利於經濟開展所需的創意等（1951）。所以中國大陸現階段的經濟蓬勃，大概很難令人馬上歸因於所謂的「儒家文化」。

有仍待求證的空間。相對於經濟層面，儒家文化與政治治理層面的民主化關係就更差，也有更多的模糊地帶。因為西方近期的研究多指稱儒家文化不利民主發展（Huntington, 1984; Pye, 1985），但1980年代中葉以後，臺灣、韓國的轉型，日本的轉變，[3] 又挑戰了這樣的認知。目前雖有一些相關的討論，卻沒有嚴謹的實證分析（Hahm and Paik, 2003; Tan, 2004; Bell, 2006）。

就後者而言，有關儒家文化與地區經濟或政治發展關係的推論，幾乎是以「東亞地區等於儒家文化」這樣先驗式的命題來進行，也就是不再求證東亞地區的領導者或人民是否真的含蘊了儒家文化相關的信念，而以一種幾近是以果為因歸納的方式，來推論其間的關係。所以，看到亞洲四小龍經濟表現優異時，就歸納式的歸因為共享的儒家文化價值（Berger, 1984; Harrison, 1992）；而看到當時四小龍並不具備民主體質，加上分析孔夫子的思想，就推論儒家文化恐不適於民主建置。[4] 這樣歸納型的推論方式，雖也有其邏輯，但在因果的聯結上，總是相當脆弱，常禁不起現實變遷的考驗，也因此讓儒家文化與地區治理效果之間的關係，仍是留白處處。

基於以上，本文試圖探討儒家信念與地方治理效果之間的關係，特別在推論方式上，一改過去以「東亞地區等於儒家文化」為前提，不求證的做法，嘗試以經驗性的調查探測該地區內領導人物的儒家信念強度，同時將Gurr（1974）的「政治表現和諧論」帶入思考，[5] 試圖探看地

---

3. 日本，雖具有民主的型式，但因自民黨長久一黨獨大的治理（1955-1992），也被認為其民主係威權的偽裝（authoritarianism in disguise），或是半威權體制（semi authoritarianism）；但1993年，日本的一黨獨治被跨黨的聯合政府取代，政治風貌為之一變，故這裡稱為「轉變」。有關日本政治情況，可參見Bradley（1997）或Gerald（1988）Huntington（1984:193~218）。
4. Huntington是其中很典型的代表，他在1984年時還預測臺灣要轉型民主相當困難。參見 Samuel P.（1984）。
5. Gurr（1974）研究91個國家，300多個政權跨越一百多年（1800~1971）的延續及變遷情形，發現權威（authority）的類型與政權的延續間存在之關係，係情境條件，也就是威權類型與相連的社會制度類型是一致的（congruence），最好威權內部也是協

方菁英間，及其與地方群眾間，在儒家信念或其他相關重要價值上的契合情形，因徒信念不足以自行，而Gurr等的「政治表現和諧論」建議：領導者間或與其領導的情境價值觀能和諧，才能有治理效能的產生。本文接續會歸納整理同一地區政治、經濟層面的實際治理效果指標，來尋求地方菁英儒家信念強度、地方價值觀和諧程度、及治理效果間可能的關係。

而到目前為止，各項經驗調查研究中，專門針對儒家信念部分做實證調查的，是廖達琪與Eldersveld等所做的「臺灣地方菁英的第二波調查研究」，[6] 其中主要針對臺灣七個縣市的地方菁英做面訪調查，[7] 所以本文的研究範圍也就以東亞地區中臺灣的七個縣市為檢證對象。相關的概念、假設及方法等，在後文中會再詳細交待。

本文計分五部分，第壹部分是此前言，第貳則是概念、假設及方法的說明，第參是儒家信念與地方和諧的檢視，第肆為儒家信念、地方和諧、與治理效能關係的探究，第伍為結論。

和的（consonance）。他稱這種理論源自Eckstein（1971）的一致——協和政治表現理論（congruence—consonance theory of political performance）。參見Gurr（1974：1482~1504）。

6. 這兩波地方菁英的調查研究，是一項國際比較研究（民主與地方統治，Democracy and Local Governance）的一部分，參與的國家有26個，臺灣調查的第一波（1993）是廖達琪主持的國科會計畫（編號：NSC82-0301-H110-035）；第二波（2001）由廖達琪及密西根大學（University of Michigan）政治系的Samuel J. Eldersveld教授共同主持，並由「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贊助。縣市抽樣是根據區域、政黨主政、人口大小、窮富均衡等原則。臺灣地區抽出的七縣市有基隆市、臺南市、新竹縣、臺中縣、高雄縣、花蓮縣，及嘉義縣。本文分析時，以第二波資料為主，因為只有這一波包含了儒家信念的調查。有關這項國際計畫及臺灣地區抽樣調查實施情形，摘要請參見附錄一。詳參見廖達琪，Eldersveld等（2001：12~17）。另胡佛、朱雲漢等的東亞計畫（The East Asia Barometer Survey），雖也做類似儒家思想的實證調查，但均是以價值取向面來詢問，如「男尊女卑」方面的支持情形，卻沒有直接問受訪者是否自認受儒家文化影響等較明顯的議題，廖及Eldersveld的問卷則包含這樣的問題，參見本文「貳之三、方法」所列之問題內容。有關胡及朱之相關調查，參見Chang, Chu and Tsai（2005：1~33）。

7. 此七縣市，參見註6之說明。

貳、概念、假設及方法

一、概念

本文所稱「儒家信念」意旨為何呢？如前已提及，儒家文明與基督教或回教文明最大的區別，是沒有「真神」概念，而以「人」為中心，強調領導者的重要（Weber, 1951; 1978），並以血緣、親族為系絡發展出一套「差序格局」（費孝通，1991）。在這一套文化系統中，律法被視為較次等的治理手段，禮教德治才是統治的正道（廖達琪、許家豪，2002；廖達琪，2004；Tan，2004），而倫常秩序中人際關係的重要性也勝於法治紀律（Hsu, 1975；劉述先，1999；杜維明，2005；Tu, 1979, 1984, 1989, 1991）。綜合這些概念，本文將儒家信念建構在人治倫常與法治紀律兩大主軸議題上，一方面是試圖歸納出儒家信念演化到現代為各方所接受的特質，也就是韋柏、杜維明、費孝通等東西方學者所共同感知，儒家在社會生活層面所含融的深厚集體意識，家族主義，強烈自我約束紀律及服從宗長等特性，以「人治倫常」這一角度來統攝這些義理；另一方面對於「人治倫常」的對立面「法治」，[8] 因是儒家文化信念中的異生物，但又是現代民主社會中所強調及培育的價值觀；所以，在概念建構上，特別以這個「法治」面向，來試圖了解傳統理解儒家偏「人治」的價值觀，在現代民主強力要求「法治」的氛圍中，受到多少影響。而儒家信念強者，則定位為表象上承認自己深受儒家文化影響，且在價值態度層面上，也仍強調「人治倫常」重於法治紀律，以求表裡某種的一致性。至於此概念的具體運作化，則在「方法」部分交待。

「地方治理效能」這一概念，在文獻中也有不同的檢核方式，如主

8. 這裡所言之「法治」，英文為rule of law，而非legalistic rule或rule by law。因為在儒家的學派中，也有尚法這一派，如荀子及其弟子李斯，但此法並不等同於西方rule of law中law所具有自然法的境界。參見廖達琪、許家豪（2002）；Hahm and Paik（2003）；及Bell（2006）。

觀式的自我評量是否能有效解決地方問題（Eldersveld, et al., 1995；廖達琪、黃志呈，2003），也有較客觀式的以實際地方發展績效，如經濟成長率、家庭平均每戶經常性收入、失業率等做指標（Przeworski et al., 2000; Clark, 1981; Gurr and King, 1987; Teune, Jacob, et al., 1971; Putnam, 1976）。兩者相較，本文認為「儒家信念」已是從主觀認知上來了解，在「治理效能」上，再以主觀評量來論斷，實不夠「客觀」，且過去文獻對儒家文化與治理效能的聯結，都是從較客觀的實體治理績效出發（如經濟成長率，政體民主化程度等），故本文在「地方治理效能」的概念上，同樣是以較客觀的實際績效為指標，同時含括政治及經濟兩層面，政治層面的績效以地方民主化發展情形為考量；經濟層面則是以地方經濟發展情形為依據，具體的指標也是容後再說明。

二、假設

「地方治理效能」既分政治、經濟兩部分，且文獻上對儒家文化與這兩部分的關係也有不同的看法，所以本文的假設也分這兩部分來討論。

就儒家信念與地方政治民主化的關係而論，前人研究雖多集中在國家範圍民主化的討論（Huntington, 1984; Pye, 1985），[9] 很少進一步深入到國家境內的地方，但得出的基本結論，似均不期待儒家文化會非常有利於西方式的民主發展，[10] 因為儒家的重視集體、家父長式的威權結

9. 儒家與民主的概念、理論是否能相通，清末民初時相關的討論非常多，可參見Tan（2004: 1~16）在Confucian Democracy中第一章的介紹。不過談到與民主化的關係，或較偏實證性的探討，則很少見。

10. 這裡特別強調「西方式的民主發展」，是因為曾經有學者（Neher, 1994; Kausikan, 1997; Chan, 1997）提議「亞洲式民主」（Asian Style Democracy）的概念，希望對民主政體的認可，不是從西方的角度，而能納入亞洲價值如：恩護型的社群主義，人治、服從威權等，來看待如新加坡或中國的政體。學者Chao, Myers, 及Robinson（1997）更跳出來，替中國辯護，認為可以創建中國式的民主（Chinese Style），只要可以有效的解決問題（effective democracy）。不過，也有日本學者Fukuyama（1997）認為這些訴諸亞洲文化的特殊性，來企求建立亞洲式民主的論說，只是一

構、及沒有個人自主（individual autonomy）這樣的價值觀，至少均與自由民主主義（liberal democracy）看待每個人為獨立平等的個體，並賦予相應權利的基本理念不能相容；不過這些理念價值的差異，並不能合理解釋臺灣及韓國的轉型民主（Liao, 2000）。所以學者如Tan（2004）及Bell（2006）等試圖從理論概念中去探尋，儒家的核心價值中「社群」及「有德領袖」如何能在民主程序中運作，不過他們的結論都是希望超越西方自由民主主義的框架，來看待東亞的民主，甚或建議「儒式民主」（Confucian Democracy），將儒家價值嫁接在民主體制上，以培育出民主新品種。總言之，大概沒有學者能沒有保留或沒有做轉化處理的，將儒家價值觀與一般熟稔的自由民主概念或體制作直接正面的因果連結。

以上這些文獻，都是以國家為範疇的討論，並未推演到地方，直接援引作為本文建購假設的基礎，因分析層級不同而可能有推論的謬誤；但在沒有其他相關的研究下，前人的發現對本文形成假設仍有啟發性。所以，本文對儒家信念與地方民主化的假設是：基本上無關，但也無傷。

就儒家信念與地方經濟發展的關係而言，Kahn在1979年首先予以肯定聯結，Berger（1984, 1988）及Harrison（1992）等再接續予以確認，其後，相關深入的討論較少。[11] 基本上，他們共同的看法是：儒家文化的一些基本特質如自我約束、服從紀律所展現的工作倫理，也就是一般所認知的「勤快」，以及家族延伸的企業集團，再加以國家領導菁英仍保有儒家傳統要求的「養民」及「均富」等理念，對經濟活動的生產面，

種幻象（illusion），很難成真。所以「民主」是否可以有不同標準來認定，目前還是爭議中的話題。

11. Thomas Sowell在1994年的Race & Culture: A World View著作中，也提到類似概念，不過他比較強調族裔的問題。最近，則是Huntington仍堅持文化影響了經濟發展，Huntington（2000：13）。另外Hahm and Paik（2003）也以荀子的「法儒」（Legalistic Confucianism）思想和東亞的經濟發展作因果討論。

多予鼓勵及扶助，對分配面則介入但不深入，才能解釋東亞這些國家在七〇到八〇年代經濟快速起飛又能分配不錯的現象。

再從近幾年的實務面上看，東亞地區的韓國、日本、臺灣雖都經歷了九〇年代末期亞洲金融風暴，[12] 經濟成長也呈現一些衰頹，[13] 但目前都在逐漸回穩中，而且與世界其他地區相較，如拉丁美洲、中東地區、南亞等非儒家文化區，經濟表現還是相當亮眼。而中國大陸這一塊最大，傳統也被歸類為儒家文化的地區，1950到八〇年代受共產主義的禁錮，經濟表現甚差，但八〇年代以降的改革開放，經濟發展之快速舉世咋舌。[14] 所以整合看來，儒家文化背景與一國之經濟發展似應為正相關，但前提條件似是領導階層並不推行違反儒家信念的一些做為。只是從國之層級落實到地方，這種關係是否依然存在，以前的文獻對這方面的討論一樣從缺。所以本文仍是一本大膽假設，再小心求證之態度，提出儒家信念與地方經濟發展的假設是：正相關，但環境條件是這正向關係產生的重要基礎。而這環境條件所指涉的是領導理論所強調的領導的信念價值作為，應與環境中的價值觀協調一致，才會帶來有效的領導。具體一點說，應用Eckstein（1971）及Gurr（1974）等的一致協和政治表現理論（congruence-consonance theory of political performance），領導階層的不同層級間或領導者與被領導群眾間在儒家信念或相關價值的落差上，不應太大，甚至呈現一定的協和度，才能形成較有效的團隊，造就較好的經濟治理成果。[15]

---

12. 亞洲金融風暴主要是指1997年7月肇始於所羅斯的量子基金放空泰國貨幣市場，造成大量外資撤出，迫使泰銖狂跌，而後引發一連串的骨牌效應，一路從印尼到南韓等。參見胡忠慈（1999）。
13. 如南韓、日本、臺灣在1997、98、99，再到2001年間，GDP大體為負成長，參見經濟部統計處網站：http://2k3dmz2.moea.gov.tw/gnweb/statistics/statistics01/reports/A03.xls。2005/08/02。
14. 中國大陸自1997年以降，經濟成長率每年平均在8%以上。參見行政院主計處網站：http://www.dgbas.gov.tw/public/Data/532910513171.xls，2005/08/02。
15. 如何才是有效的領導？在管理學上談的多，但並沒有定論。通常主張領導還是要因時、因地等置宜。不過，某種在理念上的和諧，尤其能形成團隊，似乎較有效，雖

三、方法

依據前面所提儒家的核心概念，以「人治倫常」為中心，「法治」則為其對立面，但又為民主社會所不能缺的價值觀；本文將這二者合併計量，一方面可以探測儒家信念在法治思想受推崇的氛圍下，仍被堅持的程度；另一方面也可以減少受訪者可能因社會鼓勵（social desirability）的關係，對儒家信念過度傾斜的表態支持，而沒有法治面向的檢核，造成對儒家信念支持度高估的現象。再依本文所採用廖達琪與Eldersveld（2001）所做「臺灣地方菁英的第二波調查研究」的經驗資料，及這項經驗資料所含的內容，「儒家信念」的運作化，是以下列八題分儒、法兩個層面來共同建構儒家信念的強度。這八題是：

儒家觀念正面認知部分：

1. 請問您是否自覺受儒家文化、孔子思想的薰陶？
2. 儒家思想特別重視倫常關係，是可以用來維繫民心，保障社會秩序的？
3. 家族、宗族、朋友之情感關係比法律重要？

儒家觀念反面認知—法治觀念部分

4. 強而有力的領袖較優良的法律更重要？
5. 法官在審判重大案件時，應該接受行政機關的意見？
6. 地方領袖如果為了地方利益而違反法律是可以原諒的？

然形成理念的過程，最好是由上而下以良好的溝通來建構。不過在測量上，就只能以結果—理念和諧不和諧—為指標。尚幸地方菁英調查訪問期間已是一個縣長與議員任期的尾聲（1998~2001），是可以驗收共識建立情形及其與績效關係的時候了。參見Mintzberg et al., (1998）。另外，政治學雖很少談領導團體與績效；不過，如前所述，Gurr（1974）研究91個國家，300多個政權跨越一百多年（1800~1971）的延續及變遷情形，發現權威（authority）的類型與政權的延續間存在之關係，係情境條件，也就是威權類型與相連的社會制度類型是一致的（congruence），最好威權內部也是協和的（consonance）。他稱這種理論源自Eckstein的一致—協和政治表現理論（congruence—consonance theory of political performance）。援引Gurr及Eckstein的概念及研究，乃在這裡也做領導群體間，及和群眾間價值觀協和的假設。

7. 政府可以根據現行法規處罰該項法規通過前的人民行為？

8. 沒有任何狀況可以允許政府忽視憲法相關的條款？

這八題中的第1題就是直接詢問地方菁英自覺受儒家文化的影響情形，答項分成「非常」、「頗有一些」、「很少」、「沒有」，及「不知道」。結果顯示高達84%的受訪菁英們自覺受「孔子思想」薰陶，只有4.8%認為「沒有」。其他7題的每一答項都包含從「非常同意」、「同意」、「不同意」、「非常不同意」，到「無意見」等五項選擇。本文針對受訪地方菁英的回應，予以計分歸類，每一題從非常同意到非常不同意，分別賦予+2，+1，-1，-2之分數，「無意見」或「不知道」為0。儒家正面認知部分，三題信度有三成七，但萃取因素能解釋的變異量近五成（46%）。在法治觀念部分，[16] 五題的信度雖有四成（0.4144），但萃取出的因素只能解釋三成的變異量；如果分成兩個因素，前兩題一組，能解釋的變異量有五成四，後三題也能有四成的解釋力。因本文重點為儒家信念，故以加權的方式，以儒家三題的因素分析得分，分別減去法家五題所萃取出的兩個因素分數，所得結果再相加即為某一地方菁英的儒家信念分數。[17] 這樣繁複的處理，希望能較有效及可信的呈現出「儒家信念」在臺灣七縣市分佈的強弱情形。

在和諧度的探測了解方面，地方菁英領導階層間的價值契合情形，分成儒家信念及民主理念兩面向，因為前者固是本文的主要關切，後者亦是本文假設中的主題之一，加以臺灣既是民主社會，領導菁英間對「民主價值」的共識或分歧，應是符合領導和諧論所強調有效能的領導是分享「重要相關價值」的條件。這兩面向的實證資料仍是以廖達琪與Eldersveld（2001）所做「臺灣地方菁英的第二波調查研究」的經驗資料

16 法治觀念部分，如果題目是逆向而問，計分會反轉，如第4題答「非常不同意」，計分是+2，表示其「法治」觀強。另，總分被除，計算至小數點後第2位。

17. 具體的公式為：（儒家-法家第一因素）+（儒家-法家第二因素）。儒家信念的調查因缺乏前人研究可參考，信度稍低，但做為初探性研究，受訪者又為菁英，尚可接受。

為主，儒家信念強弱分數的建構已如前述。

民主理念方面則選取出兩項：一為政治參與，一為政治平等。因為兩項量表的信度均可以達到五成左右。[18] 至於地方菁英與群眾間的價值協和情形，廖達琪及Eldersveld（2001）調查雖沒有群眾部分，但尚幸她們（2001）的計畫問卷中包含有10題有關民主理念的問題，[19] 而這10題同時在「臺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TEDS）的2001年問卷中，[20] 也有隨機抽樣問臺灣的群眾，其中當然包括本文專注的七縣市中的群眾。[21] 這樣的資料雖不是直接觸及儒家信念的探測，但相當程度可反映某縣市菁英與群眾間民主價值觀的差距，間接似也能推知一些該縣市菁英與群眾間觀念上的協和情形。

至於地方治理效能的運作化指標，在政治民主化方面，本文採取的指標有兩項：一是各縣市內「社會團體」的成長率，另一為各縣市議會中政黨結構的變化率。採用前者是因為民間團體的組成與發展情形，一方面是民主化過程中市民社會（civil society）形成的基本指標；另一方面，地方政府政策或與其互動情形，相當程度影響其成立發展。[22] 不

18. 在「民主理念」方面，廖達琪及Eldersveld之調查研究問卷，包含有「政治參與」、「政治平等」、「弱勢支持」等較與民主直接有關的測量題組，還有可能較間接的題組如：「經濟平等」、「資本主義」、「中央地方偏向」、「和諧崇尚」等等。本文僅採用較直接有關的部分，即「政治平等」、「政治參與」，及「弱勢支持」。後經信度檢驗，「弱勢支持」題組僅得近三成的信度，乃捨棄不用，所用相關題組列於附錄二。
19. 這10題內容列於附錄三。原係由胡佛（1998）建構，經其同意後，亦轉用於廖和Eldersveld之調查研究。
20. TEDS係國科會社科中心支持的政治學門年度大型調查案。目前已完成2001到2006的調查。本研究所採用的為2001年立法委員選舉全國面訪群眾的調查資料，以配合廖和Eldersveld地方菁英調查研究執行的時期（2000~2001）。而這10題因係由胡佛（1998）所建構，在群眾調查中經常使用，故TEDS2001也包含這10題。
21. 這七縣市中被成功訪問的群眾有435個，皆為20歲以上，在該地設有戶籍者。各縣市人數分配為：基隆市38人，新竹縣56人，臺中縣97人，嘉義縣55人，臺南市40人，高雄縣93人，花蓮縣56人。
22. 比如地方政府鼓勵地方成立某種公益性質社團，如高雄縣在余政憲任縣長時（1994~2001），鼓勵成立婦幼權益保障性團體，透過經費的補助，讓這方面的人力聚集成社團來爭取。而高雄縣的社團成長，也在此時期中由較緩慢的成長轉為較快

過，因為某些方面的民間團體如工、商會等，和地方經濟結構有相當關係，和地方政府的施政可能關係不大；所以，社會團體成長率的指標，會以較長期（如兩任縣長任期8年）來觀察以克服產業結構影響的問題。至於其運作情形及對縣市政府政策的影響力等，雖也是重要的民主化指標，但相關系統化的資料不易尋得，[23] 故本文無法深入涉及到這一層面。至於第二項指標，採用的主要理由為民主化的基本面向之一即是反對黨的存在，並能從事有效的選舉競爭而佔有一定的議會席次。（Dahl, 1971; Diamond, Linz, and Lipset, eds.1988, p. 16）臺灣因為國民黨一黨威權相當久，地方議會多呈現國民黨一黨獨大的現象，但1986年民進黨成立後，地方議會內的政黨結構也有所改變，其改變的幅度應可以做為地方政治民主化程度的一項指標。

在經濟發展方面，本文設定的是「家庭平均每戶經常性收入」的成長率，及失業率這兩項。因為這兩個指標可以較含括性的呈現各縣市的整體經濟發展或成長情形。至於其他可能的指標，如服務業或工業成長率，可能都偏於某一產業的情形，而不具全面性績效的代表性。

在分析的策略上，本文將先求得臺灣七縣市菁英儒家信念的平均數及標準差，進而探測七縣市菁英與菁英間、及菁英與群眾間相關價值的協和度，來歸類排序出儒家信念強、領導上又展現價值和諧的縣市；最後再檢定這樣的縣市排序與治理績效各項指標的關係。

參、儒家信念與地方協和度

七縣市的「儒家信念」的強度如何呢？表1即呈現各縣市菁英儒家信念分數的平均數、標準差及排序。

速。其中變化，本文在後面表6中會呈現。

23. 「社會團體」成長率可以有系統的根據各縣市年度統計要覽，來進行整理。所參考的縣市統計要覽，列於後面「參考書目」中。

表1　七縣市「儒家信念」平均數、標準差及排序

縣市	平均數	排序+	標準差	排序++	樣本數
基隆市	-0.35	7	2.04	1	81
新竹縣	0.80	1	2.62	6	97
臺中縣	-0.32	6	2.49	4	101
嘉義縣	-0.13	4	2.28	2	107
臺南市	0.05	3	2.82	7	72
高雄縣	-0.25	5	2.36	3	109
花蓮縣	0.21	2	2.55	5	96

+：以平均數最高的為第1，依次排。
++：以標準差最少的為第1，依次排。

表1中顯示新竹縣的地方菁英有最強的儒家信念，平均數達0.8，遙遙領先各縣市；其次依序為花蓮（0.21）及臺南（0.05），平均數都還在正分內。第四名開始的嘉義（-0.13），高雄（-0.25），臺中（-0.32），及基隆（-0.35），則已進入負分範圍，雖然差距都不算大。不過，看到標準差的部分，平均儒家信念最強的新竹縣地方菁英們之間觀點的歧異性反而較大，標準差排序第6；信念第二強的花蓮，則排序第5；第三強的臺南更勇奪標準差的最後一名—第7。看來儒家信念強的地方，菁英的信念離散情形較大，反而是平均信念最低的地方基隆，菁英的觀點較集中，標準差為各縣市中最小—排序第1。

標準差的大小雖可某種程度的反映某一地方，菁英整體在儒家信念上的接近或離散程度，但有其局限，它並不能反應不同職務背景或層級間的協和情形。從領導和諧論的角度看，領導階層間分享重要的價值觀，尤其領導階層與群眾間亦能有相近的觀點，才是治理地方有效能的重要關鍵。這七縣市中各不同職務背景的菁英們在儒家信念上是趨同，還是有顯著差異？在其他相關信念上又如何呢？還有七縣市的菁英和群眾間對重要的價值觀看法接近或分歧的程度如何？

表2先呈現七縣市不同職務背景菁英與儒家信念分數的單因子變異數

分析（ANOVA）結果。

表2　七縣市菁英職位與儒家信念分數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縣市+	自由度++	F檢定	顯著性P值
基隆市	4	5.009	.001***
新竹縣	4	1.385	.246
臺中縣	4	0.326	.860
嘉義縣	4	1.108	.357
臺南市	4	2.635	.042*
高雄縣	4	2.173	.077$
花蓮縣	4	0.493	.741

+：七縣市的樣本數，均同於表1。
++：自由度為4，主要係菁英職位分為：行政人員、立委議員代表、社團領導、政黨代表、村里長鄉鎮代表等5類。
$：P<0.1　*：P<0.05　***：P<0.001

表2顯示出七縣市中，只有基隆、臺南及高雄的菁英們會因為職位背景的不同，而有強弱不一的儒家信念，或可說這三個地方不同職位的領導菁英對儒家信念較有分歧；相對的，其他四個縣市：新竹、臺中、嘉義、花蓮，則較諧和無明顯差異。

在其他相關信念方面，本文探測的是民主理念中的兩項：「政治參與」及「政治平等」，表3將這方面的探測結果整理呈現如下：

表3　七縣市菁英職位與民主理念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縣市+	理念項目	自由度++	F檢定	顯著性P值
基隆市	政治參與	4	3.14	.02*
	政治平等	4	1.45	.23
新竹縣	政治參與	4	0.95	.44
	政治平等	4	1.98	.11
臺中縣	政治參與	4	0.88	.48
	政治平等	4	8.49	.000***

縣市+	理念項目	自由度++	F檢定	顯著性P值
嘉義縣	政治參與	4	0.45	.78
	政治平等	4	0.68	.61
臺南市	政治參與	4	0.58	.68
	政治平等	4	1.93	.12
高雄縣	政治參與	4	1.97	.11
	政治平等	4	2.28	.07$
花蓮縣	政治參與	4	1.43	.23
	政治平等	4	0.66	.62

+：七縣市的樣本數，均同於表1。
++：自由度為4，主要係菁英職位分為：行政人員、立委議員代表、社團領導、政黨代表、村里長鄉鎮代表等5類。
$：P<0.1　*：P<0.05　***：P<0.001

表3述說和表2有些相似的傾向，七縣市中僅有三縣市的菁英，因職位角色的不同在民主理念上會有明顯的差異。這三縣市中，基隆、高雄在儒家信念上也有差異（見表2），只有臺中在儒家信念上雖有諧和性，但在民主理念的「政治平等」方面，卻展現不同職級間極為明顯的差異（P=.000）。其他的四個縣市：新竹、嘉義、臺南、花蓮，則不同的職位職級菁英對民主理念中的政治參與及平等的看法，均沒有達顯著差異水準。其中除臺南市外，新竹、嘉義、花蓮三縣不論在儒家信念，及民主理念兩層面價值觀，不同職位菁英均未展現差異，可說是觀點較協同。而這三縣的儒家信念平均分係較強的（分別為1，4，2，見表1），不過他們的標準差，除了嘉義（第2低，見表1）以外，幾近是墊底的高（分別為6，5），所以縣市和諧度的衡量，還必須有較多面向的資料。

其實如前所述，領導和諧論強調的有效能領導，除了領導階層間，也重視與民眾間重要價值觀的和諧情形，雖然儒家信念方面，本文無法找到民眾部分相關資料，但同樣是民主價值面向，本文所主要使用的資料來源（廖達琪 and Eldersveld, 2001），及TEDS2001的群眾調查都使用

了相同的10題，可以做對比分析。這10題牽涉五面向民主理念為：平等、參政、自由、多元、制衡（見附錄三），七縣市菁英和群眾在這五面向觀點的近似或差異情形，見表4：

表4　七縣市菁英和群眾在民主價值五面向平均分t檢定一覽表

縣市		平等			參政			自由		
		平均數	平均差	顯著性（雙尾）P值	平均數	平均差	顯著性（雙尾）P值	平均數	平均差	顯著性（雙尾）P值
基隆市	群眾	0.54	-0.34	0.007**	0.46	-0.05	0.732	0.13	-0.17	0.254
✓	菁英	0.88			0.51			0.30		
新竹縣	群眾	0.54	-0.36	0.001***	0.39	-0.02	0.872	0.29	0.25	0.097
	菁英	0.90			0.41			0.03		
臺中縣	群眾	0.59	-0.24	0.009**	0.27	-0.39	0.000***	0.14	-0.16	0.198
	菁英	0.83			0.66			0.29		
嘉義縣	群眾	0.24	-0.68	0.000***	0.11	-0.58	0.000***	0.04	-0.25	0.050*
	菁英	0.92			0.69			0.29		
臺南市	群眾	0.45	-0.43	0.005**	0.25	-0.43	0.005**	-0.08	-0.43	0.012*
	菁英	0.88			0.68			0.35		
高雄縣	群眾	0.40	-0.57	0.000***	0.30	-0.32	0.003**	-0.08	-0.43	0.000***
	菁英	0.96			0.62			0.35		
花蓮縣	群眾	0.48	-0.42	0.000***	0.14	-0.50	0.000***	-0.24	-0.42	0.003**
	菁英	0.90			0.64			0.18		
七縣市	群眾	0.468		0.000***	0.270		0.000***	0.030		0.000***
	菁英	0.898			0.603			0.255		

縣市		多元			制衡			五面向平均	平均差排序+
		平均數	平均差	顯著性（雙尾）P值	平均數	平均差	顯著性（雙尾）P值		
基隆市	群眾	-0.54	-0.84	0.000***	-0.13	-0.48	0.004**	0.092	3
✓	菁英	0.30			0.35			0.468	
新竹縣	群眾	0.03	-0.25	0.134	0.07	-0.15	0.233	0.264	1
	菁英	0.27			0.22			0.366	
臺中縣	群眾	-0.16	-0.49	0.000***	0.07	-0.22	0.047*	0.182	2
	菁英	0.33			0.29			0.48	
嘉義縣	群眾	-0.44	-0.43	0.002**	-0.06	-0.38	0.001**	-0.022	6
	菁英	-0.01			0.31			0.44	
臺南市	群眾	-0.49	-0.92	0.000***	0.15	-0.12	0.475	0.056	7
	菁英	0.44			0.27			0.524	
高雄縣	群眾	-0.16	-0.42	0.002**	0.08	-0.19	0.093	0.108	4
	菁英	0.25			0.26			0.488	
花蓮縣	群眾	-0.32	-0.61	0.000***	0.03	-0.21	0.121	0.018	5
	菁英	0.29			0.24			0.45	
七縣市	群眾	-0.257		0.000***	0.039		0.000***		
	菁英	0.256			0.277				

*：p<0.05　**：p<0.01　***：p<0.001

+：平均差排序係「菁英五面向平均」減「群眾五面向平均」，結果再從最小到最大排序。

表4的結果很有趣，儒家信念最強（第1），不同職位菁英間在儒家信念及民主理念上都無甚差異的新竹縣，其菁英和群眾間在五面向的民主價值觀上，只有一個面向——平等，達到差異的顯著水準，而這一面向也是所有七個縣市的菁英和群眾間均展現極為顯著的歧異；其他的四個面向，新竹的菁英和群眾觀點都沒有達到差異的顯著水準。新竹以外的六個縣市，在四個面向上達到差異顯著水準的最普遍，有三個，這三個是：臺中、臺南、高雄；最少也有三個面向達差異顯著水準，但只有一個基隆市；最多在五個面向都顯現差異的，則為儒家信念相當強，菁英層級間價值觀點也趨近的花蓮及嘉義。看來，各縣市領導和諧度的評估，真不是任何單一面向可以完整勾勒。

為了能將這五面向整體能計算出一個菁英和群眾間差距的數值，並能和前面提到的各縣市菁英間和諧度的分析一起進行評估，表4中亦列出五面向菁英及群眾在各縣市的總平均，並以菁英的均分減去群眾的，再以差距大小排序，差距最小的排第一，表示菁英與群眾價值觀相去不遠，相對也就是較和諧；排序在後的則表示觀點距離遠，領導和諧度相對為差。表4的最後一欄顯示，新竹毫無疑問的在菁英與群眾的和諧度上也拿第一，其他依次為：臺中、基隆、高雄、花蓮、嘉義、臺南。這樣的排序似乎和前面表1的標準差排序頗有出入（如新竹排第6），和前面檢證的各縣市不同職位菁英在儒家信念及民主理念的共識或分歧情形，也難拼出完整的圖象，如何將這些不同面向的和諧度評估，統整推算，並能結合儒家思想的強弱情形，來檢測本文的假設：儒家思想強又與環境價值觀和諧者，在經濟層面有正面效能，在政治層面，則與民主發展無關但也無傷？

本文的做法是將地方菁英儒家信念均分排序、標準差排序、菁英與群眾民主價值觀差距排序全部並列算積分；對不同職位菁英間的儒家信念和民主理念有無顯著差異情形，則予以賦分，有顯著差異者，賦以1，表示序號積分會多1，沒有者則計以0；再以各縣市各項排序總積分重排

序，積分越少者排第1， 表示儒家信念強又地方價值觀差距小，整體結果呈現如表5。

表5　七縣市地方菁英儒家信念及和諧度積分排序

縣市	儒家信念排序	標準差排序	與群眾民主價值觀差距排序	菁英間儒家信念差異	菁英間民主理念差異	總積分	積分排序
基隆市	7	1	3	1	1	13	4
新竹縣	1	6	1	0	0	8	1
臺中縣	6	4	2	0	1	13	4
嘉義縣	4	2	6	0	0	12	3
臺南市	3	7	7	1	0	18	7
高雄縣	5	3	4	1	1	14	6
花蓮縣	2	5	5	0	0	10	2

表5的總積分顯示：新竹的儒家信念強度及領導和諧度排序加總（僅8），遙遙領先七縣市，重排序仍得第1，殆無疑義；花蓮以10積分居次，與原來的儒家信念強度排序一致，但總積分的第三名為嘉義，不是儒家信念強度原排第三的臺南市，且臺南因各項和諧度指標都不佳，總積分排序落至最後，且算遙遙落後積分第6的高雄（18 vs. 14）；比較接近難分軒輊的是：臺中及基隆，總排序積分一樣都是13，即使要以儒家信念強度為最後排序準據（臺中6，基隆7），兩地的儒家信念平均分也太接近（-0.32 vs. -0.35），似不適宜將兩地分為第4及第5，名，故表5中均以第4排序兩地。至於第三名的嘉義縣，積分與兩地雖也僅差1（12 vs. 13），但因其儒家信念均分頗領先兩地（-0.05），故坐穩第三個儒家信念強又展現較高和諧度的順位，應是頗確切的反映地方的情況。

將地方菁英儒家信念強度與地方內在各種和諧度合併計量後，本文最大的關切是這樣的結果是否與地方治理的經濟及政治層面，有如假設的預期關係？下一節即進行這方面的探討。

肆、儒家信念、地方協和與治理效能

本文假設預期的，如前所述，是儒家信念與地方政治民主化並無關係，但也無傷，地方價值觀和諧與否，並非關鍵中介因素；但在經濟發展層面，儒家信念強度與地方價值和諧度的情境條件就至關緊要，而地方政治民主化的指標，本文在「貳、概念、假設及方法」中已指出，是以「社會團體的成長率」（SGR）及「議會內政黨結構變化率」（CPC）為依據；在經濟發展方面，則是以「家庭平均每戶經常性收入的成長率」（IG）及平均「失業率」（UNEM）為指標，同時因為儒家信念及地方和諧度，均是以排序方式處理，這些指標也將依數值大小排序。

在正式檢視儒家信念，地方和諧與這些效能指標的關係前，有些可能影響這四項地方治理績效指標的因素，必須同時帶入考量。第一個因素是「社會團體」發展、「議會內政黨結構」的改變，和「家庭平均每戶經常性收入」的成長及「失業率」的高低，可能與縣市的發展程度有關，如比較富裕或都市化的縣市，可能在這些方面的表現都較好，而和治理的理念可能無關。第二個因素是縣市的人口數，人口多的縣市，通常也代表較都市化，經濟也較發達，和社會團體及家庭平均每戶經常性收入的成長會有關係，對失業率及政黨競爭的激烈情形也不無影響，所以也必須把「人口」（POP）這個變數帶入考量。

綜合這兩大可能影響地方治理績效的實體因素，除了本文原預定要用的指標：「社會團體」成長率、「議會內政黨結構」變化率、「家庭平均每戶經常性收入」成長率、及「失業率」，再納入幾項指標來含括各縣市的人口、財政、及發展情形。全部這些指標的內涵及衡量方法說明如下：

一、社會團體成長率排序：這是以七縣市統計要覽所載「社會團體」類別的數字為依據，並配合本文資料來源七縣市地方菁英受訪的時

期為準（2000~2001），而以2001年為起算年，往前推4年（1998），也剛好符合受訪菁英中縣市長及議員4年一任的任期；再以2001年的數字減去1998的，再除以1998的數字，即得某一縣市「社會團體」的成長率，最後以各縣市所得之成長比率從高到低排序。

二、議會內政黨結構變化率排序：議會內政黨結構之估算，是以國民黨籍議員所佔的比率為準據，其變化率則是以1998年那屆議會（1998~2001）中，國民黨所佔比率減去2001年底新選議會（2002~5）的，取絕對值，各縣市所得結果再依大小排序。所以會以受訪菁英中縣市長任期結束後的議會內政黨結構情形為準據，主要是考量地方菁英們如對地方的政黨競爭有貢獻，並能反映在議會席位的分布上，應是以下一期為準，而不是當期的。

三、家庭平均每戶經常性收入成長率排序：同樣以七縣市統計要覽資料為準據，計算方式是以2001年為成長點，減去1998年之記錄，再除以1998之數值，取絕對值，再各縣市依高低排序。

四、失業率排序：同樣以七縣市統計要覽資料為準據，計算方式則是將1998到2001年，每年的失業率紀錄加總，再除以4，得到每一縣市在菁英受訪時，屬於他們直接治理時期的平均失業率，然後從低到高加以排序。

五、人口數排序：同樣是以七縣市地方菁英接受訪問的時間為準（2000~2001年），而以2001年七縣市的人口數排序。[24]

六、家庭平均每戶經常性收入值排序（INCOME）：這是為掌握各縣市原來富裕的程度；時期基準一樣比照受訪菁英的時段，且因臺灣縣市長四年一任，所以家庭平均每戶經常性收入的計算仍是以1998到2001年這一完整的縣市首長及議員任期為一單元，[25] 再從高到低排序。

---

24. 這七縣市2001年人口數為：基隆市390,966；新竹縣446,300；臺中縣1,502,274；嘉義縣563,365；臺南市740,846；高雄縣1,236,958；花蓮縣353,139。
25. 這是將1998到2001年的每年「家庭平均每戶經常性收入」相加再除以4而得。

七、歲出和歲入平衡情形排序（BALANCE）：這也是為掌握各縣市財政狀況所立的指標，計算基準也是1998到2001年四年期間，七縣市各年的歲入減歲出加總後再除以4，依大小排序。

八、家庭平均每戶經常性收入成長率的上一期（1994~1997）（IG-1）排序：這是考量在2001年任期屆滿前受訪的縣市首長們，[26] 其治理效果可能承接的是上一任（1994~1997）就已舖設的成果；而如果上一期成長太快，也可能造成這一期的回歸現象，就不能歸因到菁英們治理的理念。

九、失業率的上一期（1994~1997）（UNEM-1）排序：這也是考量失業率的高低可能是地方原有產業結構的直接影響所致，或是出於上一任菁英（1994~1997）的績效，而與這一任地方菁英的治理信念或能力較無直接關聯；所以列出上一期，以考察是否會有前後期高度關聯，而與菁英的信念較無關的現象，以防止錯誤的歸因。

十、社會團體成長率的上一期（1994~1997）（SGR-1）排序：理由與前面相同。因為「家庭平均每戶經常性收入」、「失業率」及「社會團體」的成長率等，將上一期的紀錄帶入考量，除了可以了解前任縣市團隊領導績效的影響外（含同一縣市長連任的情形），[27]也可以對照出地方原來發展的程度，進一步在相關分析時，減少因縣市原本財經產業結構差異所造成的影響，而誤判為是領導團隊價值理念的影響。

十一、議會內政黨結構變化率上一期（1993~1997，1998~2001）（CPC-1）排序：同樣是以國民黨在議會所佔比率的變動為準據，只是上一期的計算，是以受訪菁英中，與縣市首長及議員同期的議會為單元

26. 訪問時間大約是在2001年4月底以前，因為下半年就進入選舉的緊張期，菁英也不願受訪。但在這七縣市中，有三位縣長在2001年底時連任屆滿，分別是花蓮縣的王慶豐，嘉義縣的李雅景，及高雄縣的余政憲。其他都還有機會尋求連任。也因為有的縣市首長是連續治理8年，有的則為4年，故施政時期不同，也可能影響效能，所以要納入上一任期的情形，一起評估。

27. 參見註26。

（1998~2001），再與往前推一屆（1993~1997）的議會來比較,相減結果再排序。所以要帶入上一期，主要考量政黨在議會結構的改變，非地方治理層次的外生變數較多，如政黨在全國性聲望的變化，就會影響地方選舉的結果及地方議會內政黨席次的消長；所以多納入一次政黨變動率的數值，可以減少僅一次紀錄,可能出現的偶然機率。

綜合以上，各縣市儒家信念（CON）強度排序，與地方民主化指標的「社會團體」成長率及「議會內政黨結構」改變率排序，以及儒家信念強度與地方和諧度的綜合排序（CON-H）與各地方經濟發展績效指標：「家庭平均每戶經常性收入成長率」排序和「失業率」高低，還有各項可能影響這些地方績效指標變動的因素排序，整理成表6。

表6　七縣市「儒家信念」「地方和諧」與政治民主化及經濟發展相關指標排序

	CON	SGR	CPC	CON-H	IG	UNEM	POP	BALANCE	INCOME	IG1	UNEM1	SGR1	CPC1
基隆市	7	5	6	4	5	7	6	3	2	6	7	7	1
新竹縣	1	1	5	1	2	1	5	4	1	5	1	3	6
臺中縣	6	4	2	4	4	3	1	7	3	7	3	2	4
嘉義縣	4	6	1	3	1	2	4	1	7	1	2	4	3
臺南市	3	7	3	7	6	6	3	5	4	3	6	6	7
高雄縣	5	2	6	6	7	5	2	6	6	4	4	1	5
花蓮縣	2	3	3	2	3	4	7	2	5	2	5	5	2

CON: 儒家信念
SGR: 社會團體成長率
CON-H: 儒家信念及地方和諧綜合指標
IG: 家庭平均每戶經常性收入成長率
UNEM: 失業率排名（最低者為1）
POP: 人口數
CPC: 議會內政黨結構變化率，以國民黨佔本及下屆議會席次比之差排名
BALANCE: 歲出和歲入平衡情形
INCOME: 家庭平均每戶經常性收入值
IG1: 上一期家庭平均每戶經常性收入成長率
UNEM1: 上一期失業率排名（最低者為1）
SGR1: 上一期社會團體成長率
CPC1: 上一期議會內政黨結構變化率

表6特別分出三個區塊，第一個區塊是「儒家信念」（CON）與地方民主化的兩個指標：「社會團體成長率」（SGR），與「議會內政黨結構變化率」（CPC）；第二個區塊是「儒家信念及地方和諧的綜合指

標」（CON-H），與地方經濟發展的兩個指標：「家庭平均每戶經常性收入成長率」（IG）及「失業率」（UNEM）；第三個區塊則為其他可能影響前面四個地方效能展現的因素，包括：「人口數」（POP）、「地方歲出歲入平衡情形」（BALANCE）、「家庭平均每戶經常性收入值」（INCOME）、「上一期家庭平均每戶經常性收入成長率」（IG1）、「上一期失業率」（UNEM1）、「上一期社會團體成長率」（SGR1），及「上一期議會內政黨結構變化率」（CPC1）。

第一個區塊主要在探測儒家信念強度與地方民主化的關係。從「儒家信念」強度的排序上看，第一名的新竹縣，「社會團體成長率」的排名也是第一；第二的花蓮，也拿了第三，看來不會是負面關係；但「儒家信念」第三的臺南，卻在「社會團體成長率」上殿後，列了第7，這樣的排序關係似多少呼應了本文所假設的：儒家信念與民主發展無關，但也無傷。如果再繼續看與「議會內政黨結構變化率」排序的關係，也傾向肯定這樣的假設，「儒家信念」強的前三名：新竹（1）、花蓮（2）、臺南（3），在這一項的排名為：5，3，3，又是有點連又不太連的現象。

第二區塊則是在探討儒家信念強度結合地方和諧度（CON-H）與經濟表現的關係。這個結合指標排序前三名依序為：新竹（1）、花蓮（2）、嘉義（3），而這三縣在「家庭平均每戶經常性收入成長率」（IG）排序為：2，3，1；在「失業率」（UNEM）排序則為：1，2，4，看來頗有正面相關性，尤其和前面單純儒家信念與民主化指標的排序情形對比，頗大異其趣。

第三區塊的其他因素群，牽涉的數字太多，實不易用人工方式判讀，且前面兩個區塊內的關係也不能僅以前三名為準；所以，雖然本文案例只有七個，還是必須借重無母數相關（Nonparametric Correlations）統計方法，[28] 來檢證表6中各項變數不同排序間的可能關係，作為驗證本

28. 因為這些都是次序變數的資料，用無母數的Spearman等級相關即能檢證其間的關係。參見林清山（1998：460~464）。

文假設的一項依據。所得結果如表7。

相關檢定再次確認了前面的觀察。在第一區塊儒家信念與表7中的地方民主化指標方面，相關係數雖為正（Spearman’s rho=.321及.164），但沒有達到顯著的程度，可以說兩者間沒什麼關係；但因是正值，所以也可說儒家信念即使強，並不傷害地方社會團體的發展，也不干擾議會內政黨結構的變遷情形。附帶一提的是：「儒家信念及地方和諧綜合指標」（CON-H），與地方民主化相關指標相關係數也為正（.523及.174），但亦未達顯著水準，可說一樣無關也無傷。這其實頗符合本文根據前人研究所提出的假設：儒家信念固然和民主化無關也無傷；儒家信念強又能處於價值和諧的領導情境，所造就的績效，多是經濟面的，沒有文獻提及是政治民主化方面的成果。

表7中第二區塊顯示的相關情形，就進一步確認了本文對儒家信念與地方經濟發展關係的假設，也就是地方價值和諧是必要的中介變數。因為僅以「儒家信念」強度（CON）排序，和兩項經濟指標：「家庭平均每戶經常性收入成長率」（IG）、平均失業率的低高順序，雖然有正向關係（.429，.536），但都未達顯著水準；而「儒家信念及地方和諧綜合指標」（CON-H）；則和「家庭平均每戶經常性收入成長率」（IG）有顯著的正相關（Spearman’s rho=.847, p=.016<.05），和平均失業率，也算達顯著正相關水準（Spearman’s rho=.721, p=.068<.1）。雖然 ，這兩個經濟績效指標間也頗有相關性（Spearman’s rho =.786, p=.036<.05），似乎顯示地方原來的地方經濟發展狀況一定程度的影響這兩個指標，不見得是這一期（1998~2001）菁英的實際治理績效；不過第三區塊所顯示一些可能因素與這兩指標的相關情形，又可去除這樣的疑慮。

表7第三區塊中（表中從POP以後所有項目），主要影響地方菁英儒家信念與地方和諧綜合指標，和地方經濟表現因果連結的項目，只有上一期的失業率（UNEM1，1994-97）和本期（UNEM，1998~2001）達極顯著相關水準（p=.000）的這一項。這似表示地方原有的產業特性及經

濟發展情形相當深刻的影響失業率，如新竹縣兩期都因失業率最低而名列第1（見表6），會不會因為是來自中央在此設置科學園區的影響，而無關於地方菁英的治理理念及風格？這雖看來是合理的推測，但本期「家庭平均每戶經常性收入成長率」（IG），與上一期（IG1）的低相關（Spearman's rho=.32, p=.48），又否證這樣的推測。尤其同樣的新竹縣，上一期「家庭平均每戶經常性收入成長率」（1994-97）的排序為第5，當期（1998~2001）則進步到第2（見表6），而這兩期在縣政府中確實為不同的治理團隊。[29] 同時其他非連任的縣市首長團隊，[30] 相較於連任的，在「家庭平均每戶經常性收入成長率」這項指標上，確實顯示較大的變化；也就是非連任的排序差是：基隆1、新竹3、臺中3、臺南3；而連任的則為：嘉義0、花蓮1、高雄3（見表6）。這傾向也再次說明治理團隊不同的可能影響，再加上第三區塊的其他各項地方既有的人口及財經條件等，與當期的「家庭平均每戶經常性收入成長率」及平均失業率，都沒有顯著的相關，更凸顯儒家信念強度與地方和諧這一綜合指標，與這兩項經濟表現指標有關連的意義；不過相較起來，失業率較受地方既定產業結構的影響，「家庭平均每戶經常性收入成長率」才是地方菁英治理理念及作風產生效果的主要場域。

表7第三區塊中還有四項關係係數達顯著水準，分別是：「人口數」（POP）與財政平衡情形（BALANCE）（Spearman's rho=-.786, p=.036<0.05）；上一期「家庭平均每戶經常性收入成長率」（IG1）分別與財政收支平衡（Spearman's rho=.679, p=.094<.1），及「家庭平均每戶經常性收入值」（Spearman's rho=-.75, p=.052<.1）；還有「上一期失業率」（UNEM1）與「上一期社會團體成長率」（SGR1）（Spearman's rho=.679, p=.094<.1）。其中較可能干擾本文所檢證因果關係的是：上一期「家庭平均每戶經常性收入成長率」與「家庭平均每戶經常性收入

29. 新竹縣1994至1997年縣長為范振宗；1998至2001年縣長為林光華。並請參見註26。
30. 參見註26。

值」的負相關，其他的如人口數與財政平衡情形的負相關，顯示人口愈多的縣市，財政愈不容易平衡，這也合乎常理；而另外兩項則一來相關係數較低（P=.094），二來主要為上一期因素間的關係，與本文檢證的主題較無關，所以不在此多做討論。

至於上一期「家庭平均每戶經常性收入成長率」與「家庭平均每戶經常性收入值」的負相關，顯示的意義是：如果一個地方原來就較貧窮（家戶平均收入低），在平均收入成長率上較容易有表現，不見得能歸因於菁英治理的績效。本文所探討的七縣市中，嘉義縣就相對是最貧窮的，所以在「家庭平均每戶經常性收入值」排序是第7（見表6，INCOME項），而嘉義連續兩期在家庭平均收入成長率上都是第1（見表6「IG」及「IG1」項），會不會是因為低收入而造就了高成長率呢？尚幸，這樣的關係主要展現在上一期「家庭平均每戶經常性收入成長率」與「家庭平均每戶經常性收入值」，本期的成長率（IG）則與平均收入高低（INCOME）完全無關（Spearman’s rho=.000）。所以，或可說連任的嘉義縣菁英團隊，在第一任期（1994-97）上成就家戶平均收入成長率的第1名，或部分拜原來低收入之賜；但第二任期（1998~2001）的第1名，應非僥倖，治理團隊的儒家信念以及地方價值和諧的氛圍應有其貢獻！

整體而言，表7針對七縣市儒家信念、地方和諧，及各項政治民主化、經濟發展等指標排序所做的相關檢定，仍是肯定表6的排序趨勢，也是進一步確認本文的假設：儒家信念或無助於民主化發展，但也無傷；對經濟表現，則必須透過一個重要價值觀契合的情境，才能有積極正面之效果。

伍、結論

本文試圖探討儒家信念與地方治理效能間的關係。根據相關的研究及文獻，本文提出的假設是：儒家信念與地方的民主化發展無直接關

係，但也無傷；對地方的經濟發展應有正面效益，但其條件為：地方領導群體間或地方菁英與群眾間，對儒家信念或相關價值有相當的共識。本文所運用的資料主要為廖達琪和Eldersveld於2000~2001年主持完成的「臺灣第二波地方菁英調查研究」中，所訪談臺灣七縣市菁英的紀錄，另外輔以2001年「臺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TEDS）訪談民眾有關民主價值的部分資料。

所得結果為：七縣市依據「儒家信念」強度排序，確實顯示和地方政治民主化績效指標——「社會團體成長率」及「議會內政黨結構變化率」，沒有關係，但也不構成傷害；和地方經濟發展的指標——「家庭平均每戶經常性收入成長率」與「失業率」，則必須透過領導階層間的儒家及民主信念、以及領導與群眾間的民主價值都相近的情境，才能有顯著的關係。

綜合以上，儒家信念與地方治理效能，雖如假設預期，有政治上不妨害民主，經濟上有助於發展的功效；但儒家信念發揮治理效能的具體作為，還有待進一步的研究及探索。如本文所引用的「政治表現和諧論」，雖有助於本文進一步探測領導所面臨情境和諧與否這一中介變項，但無助於進一步了解是領導階層努力經營出來的價值和諧情境，還是原來情境特質引導了領導階層的風格？儒家信念強又價值觀和諧的三縣：新竹縣、花蓮縣、嘉義縣，在具體的領導風格及做為上：是大刀闊斧，還是漸進保守；是講求績效，還是重視過程；才有經濟上較好的表現，及政治上不至於與民主化脫鉤的現象？這都不是本文能答覆及應答覆的。

本文提出這些疑問，一方面說明文化信念與實際治理效果間有複雜的機制及具體作為的傳輸，不是任何簡單的因果關係描述可以含括；另一方面，也希望這樣的探討可以提供未來對此議題有興趣的研究者，做進一步探測的參考。

表7　七縣市「儒家信念」「地方和諧」與政治民主化及經濟發展相關指標排序無母數相關檢定[31]

		CON	SGR	CPC	CON-H	IG	UNEM	POP	BALANCE	INCOME	IG1	UNEM1	SGR1	CPC1
CON	相關係數 顯著性（雙尾） 個數	1.000 . 7	.321 .482 7	.164 .726 7	.523 .229 7	.429 .337 7	.536 .215 7	-.357 .432 7	.286 .535 7	.036 .939 7	.500 .253 7	.429 .337 7	.036 .939 7	-.464 .294 7
SGR	相關係數 顯著性（雙尾） 個數	.321 .482 7	1.000 . 7	-.455 .305 7	.523 .229 7	.071 .879 7	.429 .337 7	-.107 .819 7	-.214 .645 7	.286 .535 7	-.286 .535 7	.464 .294 7	.607 .148 7	-.071 .879 7
CPC	相關係數 顯著性（雙尾） 個數	.164 .726 7	-.455 .305 7	1.000 . 7	.174 .709 7	.600 .154 7	.509 .243 7	.218 .638 7	.218 .638 7	-.382 .398 7	.382 .398 7	.400 .374 7	.055 .908 7	-.018 .969 7
CON-H	相關係數 顯著性（雙尾） 個數	.523 .229 7	.523 .229 7	.174 .709 7	1.000 . 7	.847* .016* 7	.721 .068$ 7	-.595 .159 7	.541 .210 7	.234 .613 7	.126 .788 7	.577 .175 7	.054 .908 7	.306 .504 7
IG	相關係數 顯著性（雙尾） 個數	.429 .337 7	.071 .879 7	.600 .154 7	.847* .016* 7	1.000 . 7	.786* .036* 7	-.393 .383 7	.643 .119 7	.000 1.000 7	.321 .482 7	.643 .119 7	-.036 .939 7	.250 .589 7
UNEM	相關係數 顯著性（雙尾） 個數	.536 .215 7	.429 .337 7	.509 .243 7	.721 .068$ 7	.786* .036* 7	1.000 . 7	.071 .879 7	.143 .760 7	.000 1.000 7	.143 .760 7	.964** .000*** 7	.536 .215 7	-.214 .645 7
POP	相關係數 顯著性（雙尾） 個數	-.357 .432 7	-.107 .819 7	.218 .638 7	-.595 .159 7	-.393 .383 7	.071 .879 7	1.000 . 7	-.786* .036* 7	-.179 .702 7	-.321 .482 7	.250 .589 7	.643 .119 7	-.536 .215 7
BALANCE	相關係數 顯著性（雙尾） 個數	.286 .535 7	-.214 .645 7	.218 .638 7	.541 .210 7	.643 .119 7	.143 .760 7	-.786* .036* 7	1.000 . 7	-.286 ..535 7	.679 .094$ 7	.000 1.000 7	-.536 .215 7	.536 .215 7
INCOME	相關係數 顯著性（雙尾） 個數	.036 .939 7	.286 .535 7	-.382 .398 7	.234 .613 7	.000 1.000 7	.000 1.000 7	-.179 .702 7	-.286 .535 7	1.000 . 7	-750 .052$ 7	-.036 .939 7	-.214 .645 7	-.107 .819 7
IG1	相關係數 顯著性（雙尾） 個數	.500 .253 7	-.286 .535 7	.382 .398 7	.126 .788 7	.321 .482 7	.143 .760 7	-.321 .482 7	.679 .094$ 7	-.750 .052$ 7	1.000 . 7	.071 .879 7	-.179 .702 7	.000 1.000 7
UNEM1	相關係數 顯著性（雙尾） 個數	.429 .337 7	.464 .294 7	.400 .374 7	.577 .175 7	.643 .119 7	.964* .000*** 7	.250 .589 7	.000 1.000 7	-.036 .939 7	.071 .879 7	1.000 . 7	.679 .094$ 7	-.321 .482 7
SGR1	相關係數 顯著性（雙尾） 個數	.036 .939 7	.607 .148 7	.055 .908 7	.054 .908 7	-.036 .939 7	.536 .215 7	.643 .119 7	-.536 .215 7	-.214 .645 7	-.179 .702 7	.679 .094$ 7	1.000 . 7	-.357 .432 7
CPC1	相關係數 顯著性（雙尾） 個數	-.464 .294 7	-.071 .879 7	-.018 .969 7	.306 .504 7	.250 .589 7	-.214 .645 7	-.536 .215 7	.536 .215 7	-.107 .819 7	.000 1.000 7	-.321 .482 7	-.357 .432 7	1.000 . 7

$：P<0.1　*：P<0.05　***：P<0.001

31. 表7中所有英文標示名稱均等同前面表6之說明。

附錄一：抽樣方式說明

國際計畫（Democracy and Local Governance）對「地方」的界定，是以城市（city）為其抽樣根據，臺灣第一波的研究則將其界定在縣市層級。同樣為國際計畫一部分的中國大陸地區（總計26國參與），第一波研究抽樣，即從縣市層級，向下延伸至「鄉」及「村」。臺灣第二波研究一方面為配合國際性計畫的抽樣模式，一方面希望能和中國大陸做各種較深入的比較分析，將抽樣樣本擴大，從縣市亦往下延伸至「鄉」及「村」。

臺灣地區縣（市）級地方自治單位共有5市16縣，計21縣（市）。第一波研究原本依區域均衡、政黨均衡、大小均衡、窮富均衡等四原則，從這21縣市中抽出2市4縣（基隆市、臺南市、新竹縣、臺中縣、高雄縣、花蓮縣）。第二波的研究，是在1997年縣市長選舉造成政黨版圖重構之後推出，為了能把最新的政治情勢以及東、西部在人口密度上的差異，反映在研究樣本上，故第二波研究再增加一個嘉義縣：

1. 區域均衡：北部2個，中部1個，南部3個，東部1個。
2. 政黨均衡：國民黨執政2個，民進黨執政5個。
3. 大小均衡：人口60萬以上3個，60萬以下4個。
4. 窮富均衡：窮4個，富3個。

至於地方菁英，則依照國際計畫（Democracy and Local Governance）的統一要求，界定為：

1. 現職之地方行政首長或副首長
2. 地方政府重要一級單位主管（含民政、財政、建設、教育、工務、社會、地政、衛生、環保、勞工、農業）
3. 現任之民意代表：
   （1）抽樣縣市內全部立委
   （2）抽樣縣市內隨機抽出1/2縣（市）議員

4. 重要政黨（國民黨、民進黨、新黨、建國黨、親民黨等）縣（市）黨部領導人、主委、書記長
5. 縣市內重要社團負責人（婦女會、救國團、農會、漁會、水利會、工會、商會、青商會、獅子會、扶輪社、同濟會、環保團體之理事長、會長、社長、主席與總幹事）。為反映1993至1999年間，社會團體的大幅成長（平均約六成），第二波在縣市內重要社團負責人上，加重受訪者的比率。依抽樣縣市社會局提供之社會團體名冊，在上列12種社團中，兼顧不同類別社團數量比率，隨機抽樣。

抽樣結果訪談數，第二波為749位，成功數為663位。

第二波（2001）訪談成功數在各縣市分布情形：

	重要社團	村里長	鄉鎮市民代表	縣市議員	鄉鎮市長	區長	一級單位主管	縣市長	立委	政黨	總計
基隆市	28	15	-	16	-	5	9	1	3	4	81
新竹縣	19	13	24	17	3	-	10	1	1	9	97
臺中縣	16	13	22	25	3	-	9	1	7	5	101
嘉義縣	27	14	28	20	4	-	8	0	1	5	107
臺南市	27	14	-	8	-	4	10	1	5	3	72
高雄縣	22	13	24	24	3	-	10	0	8	5	109
花蓮縣	26	13	25	10	2	-	12	1	0	7	96
總計	165	95	123	120	15	9	68	5	25	38	663

附錄二：廖達琪和Eldersveld調查問卷中民主價值觀題組

政治參與	1	現代社會的問題都非常複雜，但只有簡單的問題才應該交付公開討論
政治參與	2	許多決定應該留給專家來判斷
政治參與	3	只有那些對某一問題有充分了解的人，才有資格對該問題投票
政治平等	4	由少數有勢力、有能力的人來做所有事情總是必要的
政治平等	5	某些人因傳統家世背景好，是比較夠資格做國家或地方領袖
政治平等	6	我們了解這複雜世界的唯一方法便是依靠我們所信賴的領導人或專家
政治平等	7	只有對問題真正了解的人，才有發言權

附錄三：菁英與群眾民主價值面向與測量變數一覽表

面向	題目
平等原則	（1）民意代表都應該由高學歷的人來當 （2）女性不應該像男性一樣參加政治活動
參政原則	（3）強而有力的領袖較優良的法律更重要 （4）政府首長等於是大家庭的家長，一切大小國事皆應聽從他的決定
自由原則	（5）大家的想法應該一致，不然社會就會不安定 （6）一種觀念能否在社會流傳，應由政府決定
多元原則	（7）一個國家如果有很多政黨，就會影響政治安定 （8）在一個地方（社區）上，如果東一個團體，西一個團體，就會影響到地方的安定與和諧
制衡原則	（9）政府如時常受到議會的牽制，就不可能有大作為了 （10）法官在審判重大案件時，應該接受行政機關的意見

以上這十題，選項皆為「非常同意」、「同意」、「不同意」、「非常不同意」、「看情形、「無意見」、「不知道」、「拒答」。

參考文獻

一、中文

林清山，1988，**心理與教育統計學**（臺北：東華）。

杜維明，2005，「儒家人文精神的核心價值」，**明報月刊**，第40卷第6期，6月：頁68~70。

胡佛，1998，**政治學的科學探究（三）：政治參與與選舉行為**（臺北：三民書局）。

胡忠慈，1999，「亞洲金融風暴後，亞太區域之各國銀行安全體系之發展」，**APEC通訊**，第五期，臺北：中華臺北亞太經濟合作（APEC）研究中心/臺灣經濟研究院，http://www.tier.org.tw/ctasc/APECnewsletter/Newsletter4%E6%9C%9F/newsletter4. htm。（2007/01/01）。

黃光國，1999，「儒家倫理與專業倫理：矛盾與出路」，**思與言**，第37卷第4期，12月：頁31~57。

廖達琪、楊日旭等，1995，「臺灣地方菁英政治文化及決策影響力之研究」，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NSC-82-0303-H-110-035。

廖達琪，Eldersveld等，2001，「民主與地方統治：第二波臺灣地方菁英之調查研究」，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委託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廖達琪、許家豪，2002，「總統擴權現象的探討——一個中西「法治」思想比較的觀點」，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主編，**憲政體制與總統權力**（臺北：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頁371~395。

廖達琪、黃志呈，2003，「民主化與地方的行動效能——從臺灣兩波（1993-2001）地方菁英的認知判斷探析」，**政治科學論叢**，第19期，12月：頁85~112。

廖達琪，2004年，「沒有孔子主義，只有馬基維利主義：公元2004年總統及立法院選舉後的臺灣行政立法關係分析」，**兩岸與國際事務季刊**（高雄：國立中山大學大陸研究所），第1卷第4期，10月：頁1~21。

劉述先，1999，「儒學的理想與實際—近時東亞發展之成就與限制之反省」，**鵝湖月刊**，第25卷第4期，10月：頁2~17。

費孝通，1991，**鄉土中國**（香港：三聯）。

行政院主計處網站：http://www.dgbas.gov.tw/public/Data/532910513171.xls。2005/08/02。

經濟部統計處網站：http://2k3dmz2.moea.gov.tw/gnweb/statistics/statistics01/reports/A03. xls。2005/08/02。

基隆市政府主計處統計要覽網站：http://bas.klcg.gov.tw/。2005/08/02。

新竹縣政府縣政統計統計要覽網站：http://www1.hchg.gov.tw/html/376440000A5224/statistic/data/stat/stmain. htm。2005/08/02。

臺中縣政府主計室統計要覽網站：http://accgov.com.tw/b3b2（92）.htm。2005/08/02。

嘉義縣政府主計室縣府統計資料網站：http://www.cyhg.gov.tw/16/accounting/index4. htm。2005/08/02。

臺南市政府主計室統計要覽網站：http://www.tncg.gov.tw/20.asp?sub1=%A4U%B8%FC%B0%CF&sub2=%B2%CE%ADp%ADn%C4%FD&page=1。2005/08/02。

高雄縣政府認識高縣統計資料網站：http://163.29.105.99/intranet/paymaster/04/yearbook/92年/92yearbkitem. htm。2005/08/02。

花蓮縣政府縣政統計統計要覽網站：http://www.hl.gov.tw/static/book/92book/92book.htm。2005/08/02。

二、英文

Bell, Daniel A. 1995. “Democracy in Confucian Societies:the Challenge of Justification,” in Daniel Bell et al., *Towards Illiberal Democracy in Pacific Asia*（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pp. 17~40.

Bell, Daniel A. 2006. *Beyond Liberal Democracy*（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Berger, Peter L. 1984. “Underdevelopment Revisited,” *Commentary*, vol. 28, no. 1（July）, pp. 41~45.

Berger, Peter L., and Hsin-Huang Michael Hsiao, eds. 1988. *In Search of An East Asian Development Model*（New Brunswick: Transaction Books）.

Chan, Joseph. 1997. “An Alternative View,”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8, no. 2

（April）, pp. 13~18.

Chang, Yu-tzung, Yun-han Chu, and, Frank Tsai. 2005. "Confucianism and Democratic Values in Three Chinese Societies," Issues & Studies, vol. 41, no. 4（December）, pp. 1~33.

Chao, Linda, Ramon H. Myers, and James A. Robinson. 1997. "Promoting Effective Democracy, Chinese Style," *Asian Survey*, vol. 37, no. 7（July）, pp. 669~682.

Clark, Terry N. eds. 1981. *Urban Policy Analysis*（Beverly Hills, CA: Sage Publications）.

Curtis, Gerald L. 1988. *The Japanese Why of Politics*（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Dahl, Robert A. 1971. *Polyarchy: Participation and Opposition*（New Haven: Yale）.

Diamond,Larry, Juan J. Linz, and Seymour M. Lipset, eds. 1988. *Politic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Boulder*（Colo: Lynne Rienner）.

Eckstein, Harry. 1971. "The Evaluation of Political Performance: Problems and Dimensions," *Professional Papers in Comparative Politics*（Beverly Hills: Sage）, pp. 1~17.

Eldersveld, Samuel J., Lars Stromberg, and Wim Derksen. 1995. *Local Elites in Western Democracie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Urban Political Leaders in the U. S., Sweden, and The Netherlands*（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Inc）.

Fukuyama, Francis. 1997. "The Illusion of Exceptionalism,"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8, no. 3（July）, pp. 4~6.

Gurr, Ted and Desmond S. King. 1987. *The State and the City*（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acgo Press）.

Gurr, Ted Robert. 1974. "Persistence and Change in Political Systems, 1800~1971,"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no. 68（December）, pp. 1482~1504.

Hahm, Chaibong, and Wooyeal Paik. 2003. "Legalistic Confucianism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East Asia," *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 no. 3（September）, pp. 461~491.

Harrison, Lawrence E. 1992. *Who Prospers? How Cultural Values Shap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Success*（New York: Basic Books）.

Hsu, Leonard Shihlien. 1975. *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Confucianism*（London: Curzon）.

Huntington, Samuel P. 2000. "*Culture Count*", in Harrison, Lawrence E. and Samuel P. Huntington, eds. Culture Matters（New York: Basic Books）, p. 13.

Huntington, Samuel P. 1984. "Will More Countries Become Democratic?"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99, no. 2（September.）, pp. 193~218.

Kahn, Herman. 1979. *World Economic Development 1979 and Beyond*（New York: Morrow Quill）.

Kausikan, Bilahari. 1997. "Governance That Works,"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8, no. 2（April）, pp. 24~34.

Liao, Da-chi. 2000. "Does Culture Matter?—A Study of Democratic Values of Local Elites in the Four East Asian System: Mainland China, Japan, Korea and Taiwan,"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vol. 8, no. 2（December.）, pp. 157~204.

Mahbubani, Kishore. 1995. "The Pacific Way," *Foreign Affairs*, vol. 74, no. 1,（January-Flebruary）, pp. 100~111.

Mintzberg, Henny et al. 1998.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on Leadership*（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Neher, Clark D. 1994. "Asian Style Democracy," *Asian Survey*, vol. 34, no. 11（November.）, pp. 949~961.

Pye, Lucian W. 1985. *Asian Power and Politics*（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Richardson, Bradley. 1997. *Japanese Democracy*（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Putnam, Robert. 1976.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Political Elites*（Englewood Cliffs: Prentice）.

Przeworski, Adam, etal., 2000. *Democracy and Development*（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Michael E. Alvarez, Jose Antonio Cheibub, and Fernando Limingo. 2000. .

Sowell, Thomas. 1994. *Race and Culture: A World View*（New York: Basic Book）.

Tan, Sor-hoon, 2004. *Confucian Democracy*（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Teune, Henry, and Philip E. Jacob et al. 1971. *Values and the Active Community*（N. Y. : The Free Press）.

Tu, Wei-ming. 1979. *Humanity and Self-Cultivation*（Berkeley: Asian Humanities Press）.

Tu, Wei-ming. 1984. *Confucian Ethics Today: The Singapore Challenge*（Singapore: Curriculum Development Institute of Singapore）.

Tu, Wei-ming. 1989. *Centrality and Commonality*（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Tu, Wei-ming. 1991. *The Triadic Chord: Confucian Ethics, Industrial East Asia, and Max Weber*（Singapore: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Philosophies）.

Tu, Wei-ming. 1992.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the Confucian Tradition* 儒家傳統的現代變化（Beijing: Zhongguo Guangbai Dianshi）.

Weber, Max. 1951. *The Religion of China: Confucianism and Taoism*, trans. by H. H. Gerth（New York: Free Press）.

Weber, Max. 1978. *Economy and Society*, edited by Guenther Roth and Claus. Wittich（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Confucian Belief and Local Effectiveness: Survey analysis on Taiwan Local Elites in Seven Counties and Cities (2001)

Da-Chi Liao
Professor of the Graduate Institute of Political Science,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Taiwan, R.O.C.;
Visiting Scholar at Hoover Institu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USA.

Abstract

This study trie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nfucianism and the effectireness of local governance. Two hypotheses are derived: from prior literature On the one hand, Confucianism should exercise no positive impact upon the development of local democracy, but do no harm to that either. On the other hand, it should be positively rela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local economy. This positive relationship, however, should be subjected to one condition, as suggested by "**congruence-consonance theory of political performance**," that local leaders' Confucian belief or other relevant values are consonant among themselves, or congruent with that of their local mass.

This study mainly utilizes survey data of Taiwanese local leaders provided by Eldersveld and Dachi Liao in Taiwan's seven counties and cities in 2001. It also uses some mass data from the project of Taiwan's Election and Democracy Survey (TEDS) done in 2001.

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are: A locality whose leaders hold relatively strong Confucian belief, generally has achieved more, in both the growth rate of its annual per household income and maintaining a low unemployment rate than that with relatively weak one does；but that has no obvious relationship with the growth rate of its civil associations and with the changing ratio of party composition in its council. However, the condition of value congruence-consonance among different elite groups or between elite and mass indeed is a crucial intervening variable between the strength of Confucian belief held by local leaders and the performance of local economy.

In sum, the hypothesized relation between Confucian belief and local

effectiveness has been primarily verified by this paper. As for the specific leadership style which may make local leaders who bear strong Confucian belief, effective in local governing still demands further research.

Keywords: Confucian belief, local effectiveness, Taiwan, local elites, congruence-consonance theory of political performance